

- ◎ 觀察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關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發展趨勢 (P2)
- ◎ ABAC 對 COVID-19 疫情立場 (P8)
- ◎ 從 APEC 看中國崛起與台灣未來的經濟戰略佈局 (P12)

觀察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關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發展趨勢

APEC 研究中心 林映均副研究員

前言

APEC 今(2020)年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 1)甫於 2 月 20-21 日，在馬來西亞太子城(Putrajaya)舉行。資深官員們本次會議重點，除了緊鑼密鼓的討論後 2020 願景聲明，另一大重點就是討論馬來西亞針對今年年度主題與優先議題領域(以下簡稱優先議領)所規劃的工作重點，並採認各工作小組與次級論壇的年度工作計畫。

作為今年主辦經濟體的馬來西亞，在去(2019)年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ISOM)定調今年 APEC 年度主題為「優化人民潛力、共享繁榮未來」(Optimising Human Potential towards a Future of Shared Prosperity)，其中包含「強化貿易與投資之論述」(Improving the Narrativ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透過數位經濟與科技促進包容性經濟參與」(Inclusive Econom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及「驅動創新永續」(Driving Innovative Sustainability)等三大優先議領。特別是在「共享繁榮(shared prosperity)」概念下，馬來西亞今年對於 APEC 議題發展的重點偏重在包容性成長面向。本文除了簡述本次會議關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提案，也觀察主要經濟體對該些提案的立場並提出分析。整體而言，本文認為目前經濟體對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發展立場分歧，不僅反映出 APEC 成員之間不同的發展需求，也將影響 APEC 未來的發展路線。

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關於包容性成長的議題

今年的包容性成長議題涉及到馬來西亞所設定的第一與第二優先議領。第一優先議領之「強化貿易與投資之論述」，主要係探討如何確保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的經濟利益使所有人民與企業雨露均霑；第二優先議領之「透過數位經濟與科技促進包容性經濟參與」，則將重點放在藉由數位科技應用以促進女性經濟參與、中小企業進入全球價值鏈與供應鏈、都市規劃、高齡化社會需求等目標。

表面上，在包容性成長的目標下，此二優先議領都是探討經濟成長的利益如何與更多人民與企業分享，並且有助於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但是，此二者所建議的實現路徑卻有所不同。第一優先議領是從以總體經濟政策的角度切入，藉由擴大或轉移經貿政策的決策視野和測量指標，注入社會發展、環境效應等的考量。反觀第二優先議領，其著眼於社會發展需求，目的係針對不同社群的需求與發展條件提出可適應數位時代的因應對策，並確保經濟成長的利益分配公平。本次資深官員會議針對超越 GDP (Beyond GDP)、共享繁榮、原民經濟(indigenous economy)等議題的討論，相當程度反映出不同的思考取徑。

首先，超越 GDP 是馬來西亞今年開啟的兩個新議題之一，另一個是「共享繁榮」。馬來西亞對於超越 GDP 的發想，係考慮到既有經濟量化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GDP))無法完整捕捉到影響經濟相關的因素，如社會發展、人民福利、環境影響等，盼能透過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ttee, EC)的討論、多方利益關係人對話等帶領 APEC 經濟體凝聚共識，盼能發展出適合亞太區域與 APEC 經濟體特性的新經濟指標。目前馬來西亞希望將討論重點先聚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包容性、經濟發展中環境與永續議題的重要，以及有助於改善生活質量卻無法被傳統經濟數據捕捉的新科技發展。

本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相關活動包括，EC 委員會報告舉辦了「結構改革與超越 GDP 政策對話 (Policy Dialogue 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Beyond GDP)」、CTI 委員會轄下的投資專家小組 (Investment Experts' Group, IEG) 會議也確定將「包容與負責任企業與投資」納為固定議題。預計第二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將舉行的「超越 GDP 的多方利益關係人對話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MSD) on Beyond GDP)」、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將舉行「包容與負責任企業與投資的公私對話 (Public-Private Dialogue (PPD) on Inclusive Responsib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最後該些會議討論成果將成為馬來西亞提出替代性經濟指標 (alternative economic indicators) 的基礎。

其次，關於共享繁榮議題，該議題的發想一方面源於馬來西亞前代理總理馬哈迪 (Mahathir Mohamad) 於 2018 年 APEC 年會期間發表的演說，他於演說中表示 APEC 以自由貿易與經濟整合為核心目標的發展路線以無法因應新挑戰的新局勢，呼籲 APEC 經濟體應調整方向，並建議以「與鄰共榮、不以鄰為壑 (prosper thy neighbour and not beggar thy neighbor) 為區域發展理念。另一方面馬哈迪去年 10 月針對馬來西亞的後 2020 經濟政策展望，提出共享繁榮政策 (Shared Prosperity Vision 2030)，延續其認為應調整經濟政策的訴求。為呼應馬哈迪對於國內政策與 APEC 發展的立場，馬來西亞今年不僅將共享繁榮作為年度主題的訴求之一，更將此概念規劃為 APEC 今年發展議題之一，期盼推動亞太區域內各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繁榮共享，並且關照各經濟體國內的繁榮共享。本次資深官員會議中，馬來西亞將共享繁榮的討論聚焦在貿易與投資面向，亦即「WTO 與多邊貿易體系」、「亞太自由貿易區與區域整合」，並建議共享繁榮做為後 2020 願景的

核心價值。

最後，原民經濟是由紐西蘭向本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所召開的第一次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會(SOM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SCE)提起的新計畫，目的係蒐集各經濟體對於原民經濟的政策經驗，探討亞太區域內原住民社群的經濟潛值與發展策略，並預計將今年成果進一步發展為明(2021)年 APEC 的重點議題之一。¹

主要經濟體對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立場

APEC 經濟體對於上開三個議題的態度，雖然多數表示支持，認同該些議題有助於 APEC 擴展包容性成長的面向，但部分經濟體卻有所保留。

在超越 GDP 議題部分，中國、智利、紐西蘭、泰國與加拿大等經濟體支持馬來西亞開啟相關的討論與研究，認為有助於所有經濟體更瞭解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況，尤其是彼此在共通的經濟指標下交換資訊，更能掌握亞太區域的發展動向，並一起因應可能發生的金融、經濟等危機。反觀日本與韓國，雖然未明確反對超越 GDP 的討論，但提出兩點疑慮：第一，擔心新的經濟指標為捕捉社會、環境等因素，導致部分未能量化的資訊不具備資訊的對比性和可移轉性，如此將阻礙經濟體間的資訊互通；第二，擔心新的經濟指標對部分經濟體將造成額外的負擔，甚至可能成為新的貿易障礙工具。

紐西蘭的原民經濟提案目前獲得加拿大、澳洲、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巴布紐幾內亞、秘魯等經濟體的支持。然而，中國表示多數

¹ 紐西蘭為明年 APEC 主辦經濟體。

APEC 經濟體國內並無原住民族，也不存在相關的政策作為，希望紐西蘭可以調查相關資料後再說明 APEC 討論原民經濟的適切性。美國雖然也質疑紐西蘭的原民經濟提案，但其理由係認為此議題屬於國內政策，不宜成為區域性議題並提到 APEC 場域中討論。

至於共享繁榮部分，無論從討論議題的設定或經濟體的發言內容，均顯示出經濟體關注焦點依然不脫於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的目標，強烈支持 WTO 的改革與談判工作以及關切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實現，不僅係維持既有 APEC 對於貿易與投資目標的基調，也未達到馬來西亞所盼望強化貿易與投資目標和社會發展、解決貧富落差，甚至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的連結的訴求。此外，美國與日本也針對共享繁榮作為後 2020 願景的核心目標持保留態度，認為此概念尚未獲得所有經濟體的共識。

結論

經濟體於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中對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立場，反映出經濟體之間出現 APEC 發展路線的分歧立場。一邊是美國日本為首的已開發經濟體，堅守自由開放的貿易投資為 APEC 發展核心，並企圖將包容性成長議題侷限在既有的 APEC 第三支柱—經濟技術合作 (ECOTECH) 議題之內；另一邊是開發中經濟體為主，試圖將 APEC 議題的發展擴及到社會與環境利益衡平，以及經濟成長中的不平等議題。今年馬來西亞在其主辦經濟體的優勢下，可預期超越 GDP、共享繁榮以及其他包容性成長議題(如女性經濟賦權、中小企業的國際貿易參與)仍可順利推動，並且成為年度重點成果。但是，經濟體之間對於 APEC 發展路線的分歧，卻可能影響到今年另一大重點發展—後 2020

願景的規劃。因此，未來 APEC 對於包容性成長議題的發展，需要密切關注後 2020 願景的走向。

ABAC 對 COVID-19 疫情立場

ABAC 秘書處 程明彥助理研究員

ABAC 國際秘書處針對 COVID-19 疫情，草擬 ABAC 立場與建議，將呈 APEC 主席(APEC Chair)、APEC 資深官員主席(SOM Chair)、APEC 部長會議主席(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Chairs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秘書處摘譯三份信函之重點內容如下：

壹、ABAC 致 APEC 主席信函

ABAC 發現現今許多經濟體維持關稅、限制必要物資(醫療器材、藥品、肥皂、洗手液、口罩)之出口。ABAC 呼籲立即解除所有出口限制、並逐步消除必要物資的關稅。經濟體應致力促進必要物資及服務的貿易，並賦予醫學專家跨境移動的便利性。ABAC 號召 APEC 經濟體與 WTO 通力合作，研擬上述概念為多邊倡議。

APEC 作為經濟合作、能力建構的要角，ABAC 籲請 APEC 各經濟體現今應即刻分享最佳範例，以處理大量勞工遭受解雇、企業破產，以及其他對企業造成挑戰的經濟影響。

ABAC 將《致 APEC 貿易部長信函》列於附件給 APEC 主席，詳述 ABAC 關於業務連續性(business continuity)、供應鏈韌性(supply chain resilience)的建議。

ABAC 重申開放性市場、經濟整合、致力實現永續、包容性成長對於亞太區域的重要性。為達到上開目標，ABAC 已準備好與 APEC 共同合作。

*馬來西亞新任總理為穆希丁(Muhyiddin Yassin)，APEC Chair

貳、ABAC 致資深官員主席信函

ABAC 強調應確保貨品（醫療器材、藥品、肥皂、洗手液、口罩）及服務保持自由流通，以共同對抗疫情擴散。ABAC 呼籲 APEC 經濟體分享最佳實踐等資訊，以解決急速升高的失業率與企業破產的現況。此外，ABAC 將與供應鏈連結、數位經濟相關的建議列於《ABAC 致部長會議主席信函》之中。

ABAC 非常重視本次全球流行疾病疫情所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影響。ABAC 建議 APEC 重視本次疫情帶來的長期影響，並將現階段工作思考整合到《後 2020 願景發展》，以實現區域共享繁榮。

ABAC 建議以每月為單位，與資深官員主席正式見面開會，共同檢視疫情發展以及未來議程走向。

參、ABAC 致部長會議主席信函

ABAC 注意到全球經濟面臨關稅上升、出口禁令對貨品服務的限制，ABAC 籲請 APEC 經濟體解除貿易障礙、調降關稅，來共同對抗本次疫情造成的經濟失序。

一、確保貨品服務自由流通，以對抗疫情

此外，ABAC 也建議經濟體透過簡化邊境措施，以促進貿易流通。並確保醫療專業人員，可以自由跨境移動，以協助亞太地區疫情需要，相關協助包括給予特殊簽證，包括短期工作許可。

ABAC 籲請所有貿易部長們，可以針對上開建議在 WTO 下提出可達成多邊承諾的倡議。

二、強化供應鏈連結及支持微中小企業（MSMEs）

ABAC 呼籲 APEC 經濟體應共同合作，以減緩本次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影響，特別是對於供應鏈與企業經營方面的阻礙。本次疫情對微中小企業的影響也為 ABAC 所重視。

ABAC 建議 APEC 貿易部長可以針對，為了解決急速升高的失業率與破產所採取的財政與社會安全網相關措施，進行最佳實踐的分享。

三、迅速解決其他貿易議題

疫情發生前已經存在的保護主義，對於當前受到疫情衝擊的全球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ABAC 一方面籲請 APEC 經濟體在年底前可以暫緩實施新的貿易措施，另一方面可以研擬如何減少保護主義措施的具體步驟，該些目標對於短期內亞太區域內處於弱勢的社區、企業，以及經濟體，在獲取糧食以及其他基本物資至關重要。就長期而言，該些目標將有助於促進投資以及重建企業信心。

四、強化數位連結性

ABAC 呼籲所有 APEC 經濟體，全力投入於運用數位化連結，數位科技將可提供所有亞太區域內經濟體，針對本次疫情分享知識、專家與最佳實例的平台。

舉例而言，在醫療領域數位科技可以協助專家分享關於控制疫情擴散、生產疫苗與發展治療方式等事宜；在經濟層面，數位化連結可以協助經濟體與亞太社群共同提出經濟與社會的因應措施，確保經濟活動可以在最低限度的物理性接觸實施，並且促進貿易流通。為了發揮數位連結的潛能，對所有經濟體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升國內的數位

基礎建設。

ABAC 重申開放性市場、經濟整合、致力實現永續、包容性成長對於亞太區域的重要性。為達到上開目標，ABAC 已準備好與 APEC 共同合作。

從 APEC 看中國崛起與台灣未來的經濟戰略佈局

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陳偉舜副研究員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是亞太地區層級最高，區域最廣，成員最多且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其現有成員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汶萊、加拿大、澳大利亞、智利、秘魯、墨西哥、新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台灣以及中國香港等 21 個會員國成員所組成，另設有 3 個觀察員，分別為東盟秘書處、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處。APEC 作為區域經濟整合論壇，參加成員討論項目主以「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商業便捷化」及「經濟技術合作」三大議題為主軸，為使區域各國能達到互助共榮之目標，近年來合作領域也從既有的經濟及貿易投資議題，擴增至影響區域經濟之重要議題，如預防流行疾病擴散規劃、打擊恐怖主義、減緩氣候變遷、促進婦女經濟發展、糧食安全以及落實結構改革等議題。

自 80 年代轉向市場導向經濟後，中國社會發生前所未有的轉變，一方面由中央命令式的從事計劃經濟，朝向市場導向為主的混合經濟轉變，另一方面由單一的集權式治理漸進式地走向市場民主化的實踐，1991 年中國加入 APEC 亞太經合組織，而後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作為一個亞洲區域的大國，中國早將目標布局在全球性經濟合作上，加入 APEC 區域經濟合作無疑是中國全球性經濟佈局的前哨戰，為的就是藉加入 APEC 以提高中國作為區域經濟霸權的領導者，並依靠高國際曝光率來增顯中國在全球經濟舞台的能見度。如說中國加入 APEC 是提高作為區域領導者以及提高國際曝光率，那麼中國加入

WTO 就是從「市場開放階段」過渡到「規則或制度開放階段」的重大戰略舉措，其二者不論是在社會、政治和加速成為現代化國家的意義上，都遠遠大於單純的經濟意義。

自 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外資有相當大的部分都來自 APEC 成員國，從出口數量看來 APEC 成員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群體，在共享共榮、平等互利的夥伴關係下，APEC 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 APEC，以促進中國與各成員國間雙邊及多邊合作，這與 1997 年 APEC 第九屆部長級會議和第五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溫哥華舉行，會議上提出加速 APEC 成員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並在公開文件中使用“community”一詞來描述成員經濟共同體之間的「大家庭」關係，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回顧中國自 2013 年 9 月由習近平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以來，標榜「依靠中國與 APEC 成員既有的多邊機制」，借助 APEC 既有且有效的合作平台，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運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積極與亞太沿線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經濟融合與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並於 2015 年 12 月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提供開發中國家貸款，讓相對缺乏資金的成員國家推動區域發展，更有利於中國各項建設投資資金籌措與運用。

不論是「一帶一路」或是發展亞太自貿區 (FTAAP)，均為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通航、通商和通路，最終達成自由貿易和經濟整合，不難發現，中國在推動執行「一帶一路」期間，精密籌劃諸多一連串的套裝計畫和發展 FTAAP 的同時，不免讓許多研究國際關係學者擔

憂「一帶一路」將成為亞洲版的「馬歇爾計畫」。

回溯到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美國運用的口號也是提倡西歐亟需在戰後建立現代化建設與加速經濟整合，積極對西歐國家進行經濟援助，以及協助歐陸戰後重建計畫，也因為這項計畫的展開，最終奠定了美國成為世界領袖的地位。

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唯一全球單極霸權國，基本上已無疑慮。不過在後冷戰初期，即出現悲觀式的預測，認為美國終將遭到制衡，全球單極體系只會是曇花一現(Huntington, 1999; Walz, 2000)。然而歷經相當長時間證明，美國依然維持世界單極霸權的角色，並讓一般外界看似不可撼動，而這使得國際關係學界不再討論美國終將衰退，反而開始轉而討論為何美國未遭受制衡，有部分國際關係學者認為這是由於美國的權力優勢太過強大，所以沒有出現可以匹敵制衡的國家，有些國際關係學者則認為，制衡只是還未發生，但遲早會發生²。自由主義學者 Thompson 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是善意的霸權，因此沒有必要對美國加以制衡(Levy and Thompson, 2010:7-8)，相較之下傾向折衷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 Thomas Risse 則認為，美國會適時地運用外交政策來阻止制衡發生(Thomas Risse, 2002:260-5)³。然而，針對美國在國際間維持霸權國家的時刻到底會存在多久，是否為國際體系帶來秩序，以緩和無政府狀態，John G. Ikenberry 則認為支撐美國霸權領導體系與國際自由秩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主要有四個原因：(1) 軍事力量、科技優勢，以及對世界市場支配。(2) 地緣戰略位置優勢，

² 例如 Walz. 在 2000 年於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所發表的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所持的觀點。

³ 例如 Mastanduno 在: 1997 年於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發表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中所持的觀點。

使美國與 19 世紀的英國一樣扮演離岸平衡者角色，亦使區域戰爭不至於波及美國本土。(3) 自由民主制度與國際建制，使美國霸權對其他國家而言較不具威脅性。(4) 美國本身深層的現代化力量，多種文化融合而成的社會，以及公民對民主法治的認同，使美國在世界政治發展中擁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⁴，由於在安全和經濟上所提供的公共財、地理離岸性、歷史背景、國內民主制度限制以及現代化與公民認同，將提供單極體系延續的助力，然在另一方面，美國雖在政治、軍事、科技等層面擁有相對優勢，但其他國家或區域整合進程在經濟層面上已對美國產生相當程度的挑戰。對美國而言，維持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穩定，及自身在其中的主導性，亦為支撐美國霸權領導地位的重要基礎。

縱觀各國全球經濟，自 1979 年 GDP 前 15 名國家合計佔全球的 85%，同一比重在 2019 年雖略降為 76%，但是大國主宰世界經濟的局面依舊。1979 年前 5 名 GDP 合計的比重（美、蘇、日、德、法）為 61.6%，直至 2019 年（美、中、日、德、印）為 54%，足以說明大國的變化都可能會造成全球經濟的衝擊⁵。

國防開支向來是衡量一國軍事能力最直接的指標之一，比對各國的國防開支總額或國防開支佔政府總開支的比重，便可瞭解各國在軍事上的相對實力。美國霸權的確立與鞏固一直離不開其強大的軍事後盾。單從軍費預算來看，美國國防開支佔全球總開支的 40% 以上，即

⁴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Unipolarity: The Sources of Persistence and Decline.”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287-288.

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_past_and_projected_GDP_%28nominal%29

使面臨經濟危機或財政困難，美國也未減少國防開支，以保證其軍事實力的穩步增強，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8 月 13 日，簽署總額達 7160 億美元的 2019 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即是最明顯的例子。

對比中國 2019 年在軍事支出上，國防預算數字公布為 11,899 億元，比 2018 年增長了 7.5%。中國的國防預算總額雖居全球第二，但也接近美國國防預算總額的 25% 左右，且在 GDP 佔比重中遠低於 2%。相比之下，不少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軍費開支都早已接近、達到和超過 2% 的水平⁶。由於中國軍費漲幅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率還要高，北京當局顯然在經濟成長鈍化的逆勢下，依舊急於強化軍備，並在南海、東海持續增強存在感，不免讓國際社會感到擔憂。

上述的數據，顯示出美國的軍事與經濟能力，不僅沒有因此衰退，反而比冷戰結束時期還要更為強大。這完全顛覆於美國自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頹勢印象，實際上，雖然美國在 2008 年爆發金融危機，全球受害最深的反倒是歐、日等國；就美國整體經濟而言，反而呈現逆境成長的趨勢。歐、日經濟的頹勢，著實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更強化美歐、美日同盟之間的關係。

自 21 世紀以來，國際關係學界再度興起美國終將衰退的言論，取而代之地是中國的崛起，從上述的客觀數據來看，雖然中共在經濟和軍事上急起直追，想積極拉近與美國之差距，然截至 2019 年為止，美中之間在經濟、軍事實力上，仍有一定程度上的差距。

另一方面，無論中共在經濟、軍事上如何追趕美國，只要中共一日無法成為東亞區域霸權，中共就永遠無法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為全球

⁶ <https://kknews.cc/military/69anknm.html>

的行為者，反會深陷於區域兩強無政府狀態之中無法自拔。可見美中對抗的論點已儼然成形。

由於全球體系恆常處於無政府狀態，區域層次為全球層次的基礎，就使得全球極數國有利益去干預區域層次，也就是說，雖然在後冷戰時期中，美國雖為僅存的全球極數國，全球競逐消弭，然並非是歷史終結，反而引發美國對各區域體系的廣泛干預，積極避免任何區域體系轉變為單強層級，形成另一全球極數國。換言之，中國若要競逐美國成為全球極數國，轉而成為全球層次對區域層次的干預，仍然需要持續加深對區域層次內進行干預。

近年來亞太地區已成為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的焦點，台灣位處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交會、東北亞與東南亞交口、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心節點樞紐位置上，不論是軍事或是經濟地緣都相形重要，未來如何能在美中兩大強國間擺脫政治上的干預，進而尋求周邊 APEC 成員國家協助台灣產業持續發展及加強建設內容，殊值研討。

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8 月在「對外經貿戰略會談」中通過「新南向政策」，其總體目標設定在(1)促進台灣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進而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2)建立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機制，形塑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合作共識。倡議涵蓋「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四大面向，目標市場鎖定在 18 個國家⁷，這對比於中國大陸現階段的「一帶一路」著重於區域性基礎建設，我國所提的「新南向政策」除了與東南亞及南亞鄰國建立經貿上的互惠關係以形成區域「經濟

⁷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5>

共同體意識」，另也強調「以人為本」的「夥伴關係」，由於我國「新南向政策」與中國「一代一路」目標市場重疊過高，許多國家在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壓力下降低與台灣合作意願，台灣若能憑藉我們自己優勢的條件，推動創新產業，進而帶動產業鍊發展，並有效集中整合資源，將有助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中國經濟崛起後佔全球經濟五分之一，惟今（2020）年 1 月中國全面性爆發新冠狀病毒，病毒侵襲世界各國經濟，進而牽動全球經濟令中國經濟處於劣勢，難以吸收各項衝擊，不論是貿易，還是這類病毒疫情，國際經濟專家紛紛警告若再重演 2003 年 SARS 帶來的經濟衝擊，部分國家 GDP 恐減少 1.5 至 2 個百分點，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先是受到美中貿易戰的衝擊，如今又碰上武漢新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在雙重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民間企業恐面臨一波倒閉潮，尤以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因疫情蔓延而陷入到經濟活動停滯的狀態，投資者為努力面對中國市場的不確定性並尋求自我保障的情況下，中國進出口額在全球貿易額的比重將下降，並造成中國民企的資金鍊嚴重缺口。

台灣有良好的防疫體系以及健全的金融體系，過去曾挺過 SARS 風暴，也順利渡過 SARS 所帶來的經濟風險，隨中國新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相信此刻各國將會重新考慮在未來是不是將雞蛋繼續投入中國這個籃子中而謹慎評估思考，另加上產業回台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目前已高達 6 千億新台幣的資金回台，而且立法院通過的資金回台條例，如能使台灣產業升級、創造工作機會及提升薪資，可望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除此之外，隨著這波疫情加溫，台灣的資訊安全相關產業，包括伺服器、5G 等，可能受益於美國未來的轉單效應。

台灣應趁勢把握住這波商機，加強與美產業關係，重新調整供應鏈佈局，順勢將高階研發與生產能量移回台灣，將中低階生成投入東南亞、印度及墨西哥等地，並運用過去推動三年的新南向政策，結合與美國間的夥伴關係，快速在新南向國家建立製造業基地，鼓勵撤陸台商積極進攻東協市場，整合所有資源建立企業、產業及國家品牌，以瑞士、新加坡為標竿，訂定全球品牌產業的戰略，提高產業及國家形象。